

清李同父館及其師生

蘇精著

清李同父館及其師生

蘇精著

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 蘇 精著

發行者 蘇 精
臺北市南海路43號
定 價 每冊新臺幣300元
郵 撥 第0128996-4號帳戶
印刷者 上海印刷廠
臺北市臨沂街 5 號

中華民國 74 年 1 月出版

自序

近十年來我深感興趣的主題之一，是關於清末同文館的種種。約七年前我曾試印過一本「清季同文館」，只是其中連中西年代的對照都頻頻出錯。雖然如此，我對同文館的興趣並未稍減，除了繼續蒐集有關的資料外，同時嚐試換個角度，從同文館個別師生的生平著手。

在蒐集資料方面，從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的檢索中，雖然證實總理衙門關於同文館的案卷已在庚子事變的兵燹中全數亡佚了，我還是從其中的「出使設領檔」抄錄了不少同文館出身的外交官資料，此外又獲得「京師同文館學友會報告書」等等。這些都有助於撰介個別師生的工作，因此數年來我陸續撰有十篇這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所有十五位後來曾任駐外使節的同文館學生在內。這些文章有的登在傳記文學月刊，有的並未發表，如今全都收在本書的下篇之中，但是由於資料仍然有限和個人能力不足，以及時寫時輟而沒有預定的計劃，以致各篇詳略互見、體例參差、部份內容重覆，謹此說明。

至於本書的上篇，則是就以前的「清季同文館」一書加以訂正增補，修訂較多的是關於教習、學生、及同文館的成效方面，特別是學生們在外交界與教育界工作的情况，本書已盡力包含所有已知曾任重要外交職務的同文館學生。

本書是一個圖書館員的業餘之作，如蒙大雅學人指正，實為感念。謹謝謝同事盧錦堂先生校閱一過，也謝謝許多協助我的同道，併及不計較因我業餘好寫文章而未善盡父兼母職的小女。

蘇 精 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七日

目 次

上篇 同文館研究

一、同文館成立的背景·····	1
二、京師同文館·····	11
三、上海廣方言館·····	88
四、廣東同文館·····	121
五、清季同文館的成效·····	137
六、餘論·····	162

下篇 同文館師生

一、京師同文館出身的外交使節·····	167
二、出使日本大臣汪鳳藻·····	181
三、廣方言館出身的外交使節·····	193
四、楊樞與留日學生·····	213
五、出使德奧大臣楊晟·····	221
六、蔡錫勇：張之洞的洋務專家·····	225
七、留學歐洲的同文館學生·····	235
八、首先學習外文的翰林吳嘉善·····	240
九、京師同文館資深的洋教習·····	250
十、黃勝：楚材晉用的洋務先驅·····	260
附 錄·····	267
引註書目·····	273
索 引·····	281

附 表

1	京師同文館管理大臣表·····	21
2	總理衙門歷年收入船鈔數目·····	27
3	京師同文館經費及占總理衙門經費比例·····	28
4	京師同文館西教習名錄·····	43
5	京師同文館學生科甲表·····	57
6	京師同文館歷次大考人數·····	64
7	京師同文館學生大考應試西學科數·····	66
8	京師同文館歷次大考各西學科目應試人數·····	67
9	京師同文館大學學歷洋教習名錄·····	68
10	京師同文館洋教習任教年資·····	69
11	同文館題名錄記載學生任職使館人數·····	74
12	同治二年估計廣方言館每年經費·····	95
13	光緒二十年估計廣方言館每年經費·····	96
14	光緒三十一年廣方言館經費·····	97
15	廣方言館西教習名錄·····	102
16	廣方言館學生咨送京師同文館表·····	108
17	第五次同文館題名錄英文前館學生應試情形·····	126
18	廣東同文館西教習名錄·····	127
19	廣東同文館學生咨送京師同文館表·····	134
20	光緒五年以前駐外使館開館繙譯官·····	141
21	同文館學生清末出使表·····	143
22	同文館學生清末代辦使事表·····	144
23	同文館學生清末駐外總領事表·····	144

24	同文館學生民國出使表·····	145
25	同文館學生民國代辦使事表·····	145
26	同文館學生民國駐外總領事表·····	146
27	同文館學生擔任清末國內重要外交職務表·····	147
28	同文館學生擔任民國國內重要外交職務表·····	148
29	同文館學生擔任教育職務名錄（光緒24年前）·····	155
30	同文館學生擔任教育職務名錄（光緒24年後）·····	156
31	京師同文館譯著及出版西學圖書書目·····	159
32	京師同文館第一屆留歐學生名錄·····	237
33	京師同文館第二屆留歐學生名錄·····	238

上篇 同文館研究

一、同文館成立的背景

設立同文館的原因

自道光二十年(1840)以後二十年間，國內有識之士的言論、朝廷外交的經驗、以及外國的建議三者，是同文館成立的主要原因：

一、國內的言論

從鴉片戰爭開始，朝野已有一些重視繙譯的言論和作為，林則徐在廣東的時候，曾雇人繙譯國際法以備應付英方，又譯澳門出版的外文報紙，做為主要的情報來源，並致函其他疆臣說明其重要性¹。魏源在「海國圖志」中闡發師夷長技的觀念，認為應設譯館繙譯外國圖書，其作用一面是藉悉夷情以制夷，一面是開文學之路以化除中外的坑塹²。姚瑩在鴉片戰爭時任臺灣兵備道，他在後來所撰「康輜紀行」書中，一再舉例說明外人瞭解中國

1 魏源，海國圖志，卷50，籌海總論下，頁10—11，「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
Immanuel Hsu,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pp.123-125.

2 魏源，海國圖志，卷1，籌海篇，頁39，議戰。卷51—52，夷情備采上、下。

之深，並諄諄勸國人重視繙譯以求知天下大事³。

以上三人都身當鴉片戰爭之際，到十餘年後英法聯軍時期，有識之士已進為重視繙譯人才的培育，第一位提出建議的是郭嵩燾，咸豐九年(1859)正月，郭嵩燾上「請廣求諳通夷語人才摺」⁴，剖析外國語文的重要並提出教學的辦法，翌年恭親王奏呈的善後章程中，關於學習外國語文一條的內容，多與郭嵩燾的建議相同。馮桂芬也建議培育繙譯人才，主張在上海、廣東各設一繙譯公所⁵，此為以後上海廣方言館與廣東同文館之導源⁶，而馮氏言論之更可貴者，是不以學習語文為目的，而是以之作為進一步研究西學的工具。

二、外交的經驗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天朝意象因為空前的挫折而變本加厲，西方國家對於戰後中國的態度也感不耐，因而導致第二次的戰爭。英法聯軍使中國受到更大的挫折，加上太平天國及捻亂的為害，迫使中國必需在對外態度上有所調適，以因應內憂外患踵至的局勢。咸豐十年(1860)十二月，恭親王奕訢、桂良、文祥三人在完成和約之後，痛定思痛的提出「統籌全局善後章程」，一面

3 姚瑩，康輅紀行，卷12，頁20—22，「外夷留心中國文字政事」條；卷5，頁3，「外夷講圖書」條；卷5，頁1，「外夷形勢當考地圖」條等。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四國新檔，英國檔下，第855頁，郭嵩燾，「請廣求諳通夷語人才摺」。

5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頁67—70，「采西學議」。

6 校邠廬抗議書中另篇名「上海設立同文館議」（頁99—101），有以之為清代同文館之源起者，實則此篇作於同治元年京師同文館既設之後，文內有「前見總理衙門文，新設同文館」等句可知。同治二年李鴻章請於上海廣東設同文館之奏，固出於「上海設立同文館議」一文，而此文內甚多觀念則又發自於「采西學議」，如斥通事之害、招生辦法、繙譯西書等。

檢討時局，一面建議因應措施，他們在檢討中發現不論中國是否願意，與各國交往將是不可避免的事，因此積極的建議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等六項措施⁷，其中第五項為挑選八旗子弟學習外國語文以備繙譯，這項建議便是京師同文館設立的由來。

恭親王建議學習外國語文乃是由於痛苦的外交經驗所致，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外交觸時屢次因缺乏繙譯人才而造成問題⁸，前後長逾三年的英法聯軍之役，雙方時戰時和，交涉談判也來往不絕，只是居間傳譯的總是各國的繙譯官，如以後擔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韋良（W.A.P. Martin）便是當時美使華若翰（John E. Ward）的繙譯，俄國也由當時在京的留學生擔任俄使普提雅廷（E. Putiatin）的繙譯。談判時，中國一方面昧於國際外交知識及主權觀念，爭所不必爭、棄所不當棄，一方面缺乏或故意不派設繙譯人才⁹，因此總是處於被動的地位，甚至任由俄國繙譯玩弄手脚，造成約文內容各有歧異仍無所覺、徒增困擾。

咸豐九年(1859)，僧格林沁在大沽戰守之際，因為天津縣適巧因案收管一名通曉英文的廣東人黃惠廉，如有英國來文即交其繙譯¹⁰，此後黃惠廉即成京津一帶惟一的中國繙譯。咸豐十年(1860)八月，文宗避難熱河，恭親王受命議和，此時英國參贊巴夏禮（Harry S. Parkes）先已被俘，恭親王勸令致書聯軍統帥額爾金（Lord Elgin）免戰議和，巴夏禮即親書中文信函一封，却因「旁有夷字數行，未能辨識，現聞密雲縣丞黃惠廉能識夷字，

7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1，頁22—26。

8 參見 John Y.W. Wong,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39-1860: 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pp.84,85,102,104,185,186.

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四國新檔，俄國檔，第260頁，「諭譚廷襄毋庸派通曉俄國語文之人赴津」。

10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38，頁36。

已札飭調取，俟該員到京譯出後再酌辦。」¹¹ 結果所謂夷字數行，經黃惠廉辨識却僅是巴夏禮的簽名及年月日，於是才交由僧格林沁轉遞聯軍。此事發生在北京被陷之前，當時恭親王仍冀盼停戰議和，而巴夏禮被認為是聯軍謀主，為雙方和戰所繫，不料因為署名及日期無人能識，竟在軍情緊急中延宕數日以待繙譯，無怪恭親王要嘆為「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¹²

三、外國的建議

1. 美國的勸告 咸豐八年(1858)五月，中美天津條約簽字後，美使列威廉(Hon William B. Reed)於二十日照會議約的大學士桂良等人，提出四項建議，第一項便是建議學習外國語文¹³。事實上在鴉片戰爭後中美政府接觸之始，美國已注意到雙方文化交流的問題，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望廈條約第十八條，有許其延請中國士民教習中文並採買圖書的規定。翌年的中法黃埔條約也有允許中國人民自由學習外文的規定。這兩項約文在美、法的天津條約中，都再次列入並加強文義，却因中國方面的冷淡態度¹⁴，使得直到同文館成立之前，始終是各國對中國語文的單向

11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4，頁9。

12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1，頁24。

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係史料，第1冊，305頁，「美使列衛廉致桂良等照會」。

14 道光二十四年，耆英將議妥之望廈條約（即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奏呈，軍機處議時曾對延請中文師資及採買圖書一節，加以嚴密的補充規定，例如應將延請之人姓名、年歲、眷屬、住址等呈明地方官另冊存案，所購書籍亦令各書肆另立簿冊，將書名、部數、價值隨時登載，年終彙交地方官送督撫查覈等，事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72。其後中法黃埔條約亦經援例辦理。至於咸豐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條約，雖有中國派人學習外文的規定，但在咸豐十年以後恭親王等歷次奏請設館學習摺內，卻始終未曾明言係屬條款之一。

學習。

2. 天津條約的規定 天津條約的英約第五十款、法約第三款，都有關中外往來使用語文的規定：一是兩國的公文照會均各用英法文，暫時仍附送漢文，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外文後即停附漢文照會；一是此後各項文件或文詞有所爭議時，均以英文為準。約文中雖未明定中國政府應自何時開始學習外文，但既有以英法文為準的規定，則各國公使駐京及增開口岸後交涉必多，益以恭親王等人的交涉經驗及總理衙門的設立等，學習外國語文已是必然的事，遂有各地同文館的相繼成立。

四譯館與俄羅斯文館

遠在同治初年同文館成立之前，早已有兩個由政府設立而目的在學習外國語文以備繙譯的學校：四譯館與俄羅斯文館。四譯館沿自明代，所學習的僅是朝貢國家的語文，並兼有衙門的性質；俄羅斯文館則是學習近代西方國家語文的第一個學校，而且與京師同文館的關係密切。

四 譯 館

四譯館始自明初永樂五年(1407)在北京設立的四夷館¹⁵，清

15 明太宗實錄，永樂五年三月癸酉。關於四夷館及四譯館，參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52，頁1—8，「四譯館」條；呂維則，四譯館則二十卷（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影印本，昭和3年）；Fredrich Hirth, "The Chinese Oriental Colleg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22(1887), pp.203-231.

順治元年(1644)改名四譯館，隸屬翰林院，設西番、回回、西天、百夷、高昌、緬甸、八百、暹邏八館，一面職司繙譯表章詔諭，一面教習上述各國語文。教習稱為序班，學生稱為譯字生，很多都是家傳世習此業。

由於清代制度與明不同，例如有理藩院的設立，內閣蒙古本房的司繙譯，各省通事譯錄進貢表章的辦法等，使得四譯館逐漸失去作用。乾隆七年(1742)及十三年，四譯館提督余棟兩次為改善序班及譯字生的陞遷前途上奏，竟觸怒高宗，結果四譯館奉旨歸併於接待外國貢使住宿的禮部會同館，稱為會同四譯館¹⁶，原先八館合併為西域、百夷二館，每館僅有序班一人，譯字生四人，此後一直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早已名存實亡的會同四譯館才被裁撤。

從四夷館、四譯館以至會同四譯館，所學習的全是鄰近藩服國家的語文，沒有一種是屬於近代西方國家的，可以說四譯館是中國傳統朝貢制度下的產物，但以教習外國語文而備繙譯言，四譯館以至會同四譯館確是清代第一個為此而設的學校。

俄羅斯文館

與中國最早發生政府間外交關係的近代西方國家是俄國，但是語文的隔閡造成雙方來往初期的障礙，根據中國方面的文獻記載，俄國直到雍正五年(1727)簽訂恰克圖條約，獲准派學生來華學習滿漢文之前，是不懂中國文義的。康熙二十七年(1688)談判尼布楚條約時，雙方經由中國方面帶去的繙譯官——耶穌會士法人張誠(Franciscus Gerbillon Joan)與葡人徐日昇(Thomas

16 清高宗實錄，卷 315，頁27。

Pereyra) 之助而達成協議¹⁷。

尼布楚條約簽訂後，兩國間的關係較前頻繁，因此學習俄國語文以便文書往來和交涉繙譯均有必要，同時，根據條約來華的商隊，及早先雅克薩戰爭被俘而留居北京的俄人也可充當教習，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兩次命大學士馬齊廣徵八旗蒙漢內願學習俄文者，共得六十八名，於三月二十三日在俄商居住的俄羅斯館內開學，並由俄商之一的瓦西里擔任教習，僅兩個月後因商隊結束貿易返俄而停止¹⁸。同年七月，在馬市西北大佛寺內設立學館，自北京的俄羅斯佐領內委派庫石麻和伊番兩人為教授，重新開學，並派內閣蒙古房中書常度監管。

最初數年，學館似無正式的名稱，至康熙五十五年始稱為「內閣俄羅斯文館」，據英人德貞(John Dudgeon)於同治十二年(1873)在文館舊址大門上，猶看到尚存的一塊館名牌，上書「內閣俄囉嘶文館」數字¹⁹。

俄羅斯文館屬內閣與理藩院共同管理，由內閣蒙古房侍讀學士或侍讀一人充提調官，再由理藩院委派郎中或員外郎一人兼管。文館初成立時並無章程，乾隆二十二年(1757)才經大學士傅恒等奏定²⁰，嘉慶八年(1803)、道光十九年(1839)先後兩次修訂，以後在同治元年(1862)恭親王奏擬京師同文館章程時，曾予引用並逐條比較。

17 據 C. Kirillof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hina", *Papers on the Far Eastern History*, no.14(1976), pp.61-90, 徐日昇對於俄人精通中文有完全不同的記載。徐於日記中謂尼布楚條約簽字後。俄方代表曾致贈數件各附中文詩的禮物予中國代表，而令後者為之大驚。

18 張玉全，「俄羅斯館始末記」，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專刊。第49—61頁，

19 John Dudgeon, "Sketch of Russian Ecclesiastical Intercourse with, and the Greek Church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4, no.2 (1871), pp.35-40.

20 清高宗實錄，卷539，頁23。

文館的教習最先是來華俄商，其次是俄羅斯佐領下的俄人²¹，但是到傅恒奏定章程時，說明因為再無適當的俄人堪充教習，於是改由已獲得官職的學生陞補。學生名額定為二十四名，選八旗官學生入館肄業，考試分月課、季考、歲試，月課是由教習主持，季考試卷需呈提調裁定，歲試則由提調主持。學生的修業年限並無規定，只有每五年考試授官的辦法，這項考試原由文館自行辦理，嘉慶八年起改由吏部奏請欽派閱卷大臣在上諭館考試，一等授八品官、二等九品、三等不授，各等均留館繼續學習；五年後再考列一等者各陞授一級，七品官五年後又考列一等，以主事即補。道光十九年以後，改為七品官考一等者需到部學習三年，期滿後與各項候補主事統較年資以次遞補，優待稍差。

道光十九年(1839)以後因升途不如從前優待，學生的學習情緒大減，實際上從十九世紀初期以後，俄羅斯文館已完全失其作用，嘉慶十年(1805)時，數位學生被遣送至庫倫擔任繙譯，結果竟無一人能聽懂俄人所說的任何單字²²，當時理藩院與俄國往來的文書，均送由在京俄國教士或學生繙譯，而非送到原應司其事的俄羅斯文館²³。

英法聯軍之後，由於學習外國語文的需要，文館又引起當局的注意，在同治元年(1862)經內閣奏准劃歸總理衙門辦理，當時發現全館師生中竟僅有助教一人稱得上稍通俄文而已。據李學智研究清代內閣大庫殘檔，發現俄羅斯文館學生的日常作業內容，與五年一考的試卷內容完全一樣，而評閱試卷的標準，只是依據

21 關於俄羅斯文館的俄文教習，參見 Eric Widmer,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107-109.

22 John Dudgeon, *op. cit.*; 又見 Eric Widmer, *op. cit.*, pp. 111-112.

23 關於俄羅斯文館屢次失於職守的情形，見 Meng Ssu-ming, "The E-lo-ssu kuan (Russian Hostel) in Pek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23(1960-1961), pp.19-46.

滿文書寫的工整與否，至於學生的俄文如何則不加過問²⁴。與此顯然成對比的是俄羅斯學——俄國派遣來華學習滿漢文的學生，當咸豐八年至十年中俄北京、天津條約談判期間，完全由俄羅斯學學生明長、晃明兩人居中繙譯，與俄方串通以條約內文字的歧異造成以後的糾紛而愚弄中國。同治二年京師同文館之俄文館成立後，首任的俄文教習柏林（A. Popoff）即是俄羅斯學出身的駐京俄使館繙譯官。這些留華的俄國學生後來有些成為著名的漢學家或在大學任教²⁵。

俄羅斯文館創立於中國國勢強盛的康熙年間，為中國學習近代外國語文的開端，其章程為京師同文館模倣引用，兩者關係至為密切。然而文館在創立大約一百年後已經衰落，道光二十五年（1845），俄國以三百四十七種各類圖書共七百餘冊，指定贈送「京城學習俄羅斯文藝學生」²⁶，結果奉旨交理藩院收貯後即無下文；咸豐八年（1858）文宗御賜何秋濤書名「朔方備乘」時，得知其事而圈出四十餘種進呈御覽，其餘轉存方略館；同治八年（1869）總理衙門請旨索回該批圖書，仍僅存於書庫而已，等到光緒十一年（1885）御史趙爾巽奏請繙譯該批圖書，已是贈書四十年後了，結果因大部分西學圖書均已陳舊而由總理衙門奏請免議²⁷

24 李學智，「從清代滿文繙譯俄文檔案探討對俄外交之錯誤觀念」，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8期，第113—158頁。

25 例如編著華俄辭典及其他許多著作的巴拉第（Archimandrite Palladii Kafarov, 1817-1878），及擔任聖彼得堡大學教授與俄國科學院院士的瓦習禮，（Vasili Pavlorich Vasiliev, 1818-1900），參見 Ludmilla Panskaya, *Introduction to Palladii's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uslims*, "Introduction"; 方秀，「沙俄的侵華工具—俄國東正教布道團」（歷史研究，1975年第3期，第120—129頁）。

26 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俄羅斯檔，第5頁，「理藩院咨俄羅斯薩那特衙門書籍十箱已點收進呈文」。

27 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卷5，頁12；又見王之春，使俄草，卷1，頁9—10。